



大国策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孙力 蒋璞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国策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孙力 蒋瑛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孙力, 蒋瑛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8
(大国策)

ISBN 978-7-80208-941-9

I. 通… II. ①孙…②蒋…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②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D616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273 号

书 名: 大国策: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出 版 人: 董 伟

著 者: 孙 力 蒋 瑛

责任编辑: 季利清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2.5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941-9

定 价: 5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区域发展的国际视野	001
第一节 现代国家与区域发展	001
第二节 联邦制下的区域发展	013
第三节 单一制下的区域发展	018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原则	022
第二章 区域发展的中国特色	032
第一节 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挑战	032
第二节 大国区域发展的挑战	039
第三节 多民族国家区域发展的挑战	045
第四节 社会主义追求区域发展均衡面临的挑战	052
第三章 区域发展的政府战略	058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中的政府作为	058
第二节 政府的区域组织规划	068
第三节 政府的区域财政政策	076
第四章 区域发展的市场战略	086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中的市场作为	086
第二节 市场战略在中国的实践	094
第三节 市场战略的推进和挑战	102

第五章 区域发展的第三部门战略	112
第一节 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会发展	112
第二节 第三部门战略的中国实践	119
第三节 第三部门战略面临的挑战和推进	125
第六章 区域发展的生态战略	131
第一节 区域发展的生态文明透视	131
第二节 国外生态建设与区域发展的联动案例	136
第三节 生态化区域开发的总体布局	141
第四节 区域新布局中的中国生态战略实践	148
第七章 区域发展的科技战略	156
第一节 区域发展与科技创新	156
第二节 科技创新与后发优势	166
第三节 科技战略的中国实践	175
第八章 区域发展的协调战略	184
第一节 区位优势的理论与实践	184
第二节 中国非均衡发展的逻辑	190
第三节 协调战略的中国实践	198
第九章 区域发展的公平战略	206
第一节 区域发展差异与社会公平	206
第二节 发展逻辑与公平逻辑的矛盾	213
第三节 公平战略的中国实践: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义	223
第十章 区域发展:东部率先发展的分析	238
第一节 历史禀赋的区位优势	238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	240
第三节 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254
第四节 东部率先发展效应透视	262

第十一章 区域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分析	269
第一节 现代化困境的西部凸显	269
第二节 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可借鉴的国外经验	273
第三节 制度创新的实践	281
第四节 西部大开发效应透视	296
 第十二章 区域发展:振兴东北的分析	 300
第一节 发展转型挑战的典型	300
第二节 欧美老工业基地复兴的启示	306
第三节 制度创新的实践	310
第四节 振兴东北效应透视	321
 第十三章 区域发展:中部崛起的分析	 328
第一节 发展进程中的中部塌陷	328
第二节 中部崛起的国际借鉴	334
第三节 制度创新的实践	337
第四节 中部崛起效应透视	350

第一章 区域发展的国际视野

第一节 现代国家与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情况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受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人类现代化的共同进程中,又具有一些共同的规律。

一、区域的历史演进

区域的概念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被不断地充实。早期的人类社会只有简单的方位概念,随着人类对自然界了解的扩大,人类开始对自己所居住生存的环境进行区分,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所以早期对区域的认识重心主要在自然条件方面。

中国最早具有明确区域理念并进行区域划分的著述是《尚书》,其中的《禹贡》一篇,约1200字。《禹贡》开篇就讲“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即禹勘定土地的疆界,在高山行走中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作为界域,由此,将当时的疆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实际上反映那一时代中华民族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区分。

对区域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同人类自身的生存紧紧联系在一起。《禹贡》对九州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区域的物产状况。如讲到兖州时说:

“桑土既蚕”、“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即人们栽种桑树来养蚕，这里的土地黝黑肥沃，树木水草丰盛。讲到徐州时说：“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缟。”即那里的贡品是五色土，羽山山谷的大山鸡，峯山南面的特产桐木，泗水边上可以做磬的石头，淮夷之地的蚌珠和鱼，还有那一筐筐的黑色的绸以及白色的绢。

《禹贡》对区域的划分对以后中国的区划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九州还不是规范的区划。专家们一般认为，《禹贡》文字反映的是从周朝到春秋战国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状况，乃至是理想的情况。尤其是它将对地理和区域的认识同人类生产和生存状况紧密联系的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展的高度，也对后世区划理论有着重要启迪。

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还比较弱小的状况下，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状况，如江河湖海、山陵平原以及其所决定的交通状况，成为影响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而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演进，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则主要受以下两大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历史进程中国家政治体系和管理完善对区域发展影响巨大。国家产生以后，政治权威对地理空间的划分，成为人类社会最实在的和最熟悉的区分。国家的体系和管理模式越是完善，区域的划分和治理也就越实在和越能影响社会发展的水平。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的国家体系和管理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领先水平，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治理的思想和实践也自然成为历史典范。

秦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建立起由中央直接统帅地方的国家管理模式，这种被称为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取代了疆土分封的封建制，把地方的、区域的治理直接归于中央的权力之下，使区域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样的一种进程中，中国社会郡和县的行政区划以及后来出现的州、府、道、路、省等行政区划，成为人为影响地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汉初的司马迁还提出了不同的区域划分思想，他在《史记》中，专门列出的《货殖列传》一章，可以看做是中国早期的区域经济理论著作。他将中国划分为十个主要的经济区域，即关中经济区域、巴蜀经济区域、陇西经济区域、三河经济区域、燕赵经济区域、齐鲁经济区域、梁宋经济区域、西楚经济区域、东楚经济区域以及南楚经济区域。这种划分建立在区域的自然物产、人口等因素上，没有与行政区划相对应。这无疑反映了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和对区划思想的贡献，可惜的是，这一区域思想并没有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家班固作出了更为杰出的贡献,他在《汉书》中,专门列出《地理志》一章,开创了史书对地理的记载,第一次对中国的地理状况作了专门的阐述。此前,中国古籍中有关的地理记载,包括前文所提《尚书》中的《禹贡》、《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均非专门的地理记述,基本上是融于其他的历史记载中。而班固详细考察了自远古起中国的地理沿革,从《禹贡》中的九州,到战国及秦汉的疆域,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对汉朝当代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籍数字、当地物产、风土民情以及海外交通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书》以行政区为基本依据划分区域,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典范,之后正史中的中国地理的区域划分都沿袭了这一模式。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或者研究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分封制、有着相当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度里,行政区划对区域的发展起着其他社会形态下不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景况:在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大的城市的发展,大都与政治和行政的中心有关。如北京、南京、沈阳(旧称盛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都是某些朝代或政权的都城,有的甚至是几个朝代的都城。一般来讲,越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越容易得到发展;这种中心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发展的拉动也就越久,效果也越明显;时代越是靠近,对发展的促进也越大,反之,则较小。

以北京为例,北京到近代逐步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就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和行政统治中心的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以北京为都城,公元938年,辽崛起后北京成为其陪都,因为位于其所辖疆域的南部,所以改称南京,又叫燕京。一个多世纪以后,金朝灭辽后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元兴起后,重建北京,1276年新城全部建成,成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世界莫能与比”的元大都。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获得了超常发展,辽代称为南京时,全城有2.5万户,15万人;到元代成为元大都时,统计的人户为14.759万,40.135万人口。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起,明清两代均定都北京,对北京的发展又起了重要作用。到1908年,北京人口数是70.5万余人^①,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城市。

其次,当市场经济兴起后,市场的发展,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规律则越来越

^①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7、120~121、356页。

成为区域发展和变化的主导。这一点在欧洲体现得十分明显。根据西方学者考证,在1050年,西欧可能只有两个定居点拥有1万多人口,此外,大概有24个城镇拥有2000多人口。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大贸易和制造中心在整个西欧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一些人口超过10万,截至1250年,约有5%~10%的西欧人,即300万~400万人生活在城市和城镇中。^①

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是工商业繁荣的产物,它们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而盛衰。中世纪早期兴起的威尼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贸易交汇的要冲,银行业、票据交换、货币兑换等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经济贸易繁荣拉动城市的发展,使得威尼斯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一颗明珠。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阿姆斯特丹在12~15世纪因开展东方贸易而成为重要的港口。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业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同时它也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同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股票交易所,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由此,阿姆斯特丹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伦敦也是如此,直到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工商业的发展给伦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使伦敦不仅成为英国,而且是当时世界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城市。1600年伦敦的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18~19世纪,伦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迅速拉动了城市的发展。1801年伦敦人口已到111.7万,1841年又翻一番到223.9万,1861年继续增长到322.7万,1901年时,伦敦的人口已经是358.6万。^②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区域发展使我们更多地看到政治和行政的影响和干预的话,那么,近代以来西欧的发展则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市场经济对区域发展的制约。

二、现代国家的构建特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

①[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②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①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确立后,又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的反作用。我们可以从特定的角度来观察现代国家的演进特点,以更好地考察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首先,现代国家的构建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

现代国家最早是从欧洲的封建国家中产生的。封建国家统治的基本模式为君主专制,构建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封建专制,使代议民主成为君主专制的替代物。代议民主是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构成国家权力机关从而掌握国家统治权的民主模式,它超越了古希腊实行的直接民主制。直接民主模式尽管有其优越性,但它无法超越小国寡民的限制。雅典城邦兴旺时,人口达到三四十万,有选举权的公民也有几万人,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实际上也是无法真正召开的。代议制的创新,解决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与民主政治的矛盾。所以密尔说:“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②找到代议制,就为民主政治的实践开辟了新的通路。政治家认识到“把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的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③

代议制发源于英国。英国古代有盎格鲁—萨克逊的民众大会,中世纪初期发展为贤人会议,诺曼底征服后发展为大会议,已经具有一些现代会议的特征,如讨论国王提交的任何重大问题,充当最高法庭等。14世纪中叶形成两院,到17世纪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以后,将国王变为“虚君”,终于确立了议会的统治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列宁曾经说:“如果没有代表机构,那我们不可能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④作为现代民主基石的代议制,不仅是整合民意的基本机制,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支撑,而且也是区域利益协调的重要政治机制。考虑区域代表和利益的平衡,是代议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美国在建国时,对各方面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②[英]J·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

③[美]潘恩:《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6页。

④《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52页。

利益的平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形成了两院制,按照两种基本的模式来平衡最重要的利益关系,即众议院按照人口的数量选举议员,人口多则分配的议席多,人口少则议席少,人口权重在众议院中得到体现;参议院则按照区域(州)来分配议席,州无论大小,均获得2个参议院的议席,以显示各州权利的平等。故美国50个州,共100名参议员,成为一个确定的数目。众议院和参议员权力平等,所有法案都需经两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德国的国会也是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前者由选区选出,基本上与人口相对应;后者则是州政府的代表,由各州的州政府任命其政府成员担任,每州至少有3名代表,人口超过200万的有4名,人口超过600万的有5名。

中国的社会主义代议制实行一院制,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中,也充分考虑到包括区域在内的各种利益协调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均大于其实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并且,即使是人口很少的一些少数民族(其总人口少于每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至少有一个代表。为民族区域发展的协调提供了制度保障。

总之,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为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宏观制度框架。

其次,现代国家的构建伴随着现代法治政治的构建。

现代国家成长的过程,也是法治政治成长的过程。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法制(Legal System)。英国著名法学家A·戴雪认为“法治”首要的、基本的要义就是“法律具有超越任何权力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即使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也不能排除在外”。^① 权力由法来赋予和规定,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传统社会虽然有法制,但却没有法治,因为尽管法律的体系可以达到很完整,但所有的法律都服从于君主专制的权力,权大于法。

宪法的产生和宪政的成长,是法治演进的主线。英格兰1215年的《大宪章》,是反对国王压迫的社会各阶层与国王斗争的产物。《大宪章》共有63款,包括司法与行政分立;教会自由;征税需经大会议讨论;组成委员会监督国王等重要内容。《大宪章》既是英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也是人类宪政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是,随着反对专制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一系列法律

①[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的制定,逐步形成了“国王在法律之中”或“国王在法律之下”的理念和传统,法律的地位逐步上升,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王权,确立了宪政。宪法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依据。

社会主义的法治源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1918年,苏俄即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宪政历程。旧中国没有真正确立宪政,而是军阀割据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新中国诞生后,在社会基本稳定后的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治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从邓小平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再到进一步强调政府的依法行政,直至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作为治国方略的现代法治,为区域发展和利益协调提供了基本的手段,区域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其利益的协调也必须以法治为依据。

最后,现代国家的构建伴随着民族国家统一经济体的形成。

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封建经济,乃至前封建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缺乏相互联系的强大动力。小农经济既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冲破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在前所未有的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对社会生产进行分工。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社会制度变革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①“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②

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从政治上为早期的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建立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②同上,第446~447页。

与封建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以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贸易自由,以统一的公共权威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以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来保证平等竞争,以统一的国家建设来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和有效保障,以统一和独立的国家地位来抵御国际社会的侵扰,从而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样的民族国家统一经济体的形成是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要确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统一经济体,以中国为例,它不仅对内要消除封建割据、军阀割据等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对外要在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铲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也要首先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成统一的经济体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现代国家的构建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区域的发展具有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新的宏观背景,它们决定着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等重要的制约因素。

三、现代国家的区域治理

现代国家的区域治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里选择区域治理的制度安排、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三个角度作一概述。

1. 现代国家区域治理的制度安排

任何区域治理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宪政制度对国家的区域作了最基本的划分,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

从宪政制度来看,国家结构的确定为区域治理奠定基本框架。在政治学中,国家结构是指国家在按照地域设施管理时,运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系的机制。由此,国家结构可以根据国家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和区域间关系的原则,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大的类型。

单一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确立单一的宪法和国籍,并且有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二是国家主权高度统一,对外行使主权的只能是中央权力机关;三是中央权力机关统辖国内的管理,国内按地域划分的行政单位,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单一制是国家管理中对区域的发展和协调具有较大权力的机制。

复合制是由若干具有较大自主性的政治实体联合组成各种联盟的国家结构形式,包括联邦、邦联、君合国、政合国等形式,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是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联邦政府行使国家主权,是对外交往的主体;二是联邦成员(成员国、州、邦等)在认同联邦最高立法、行政机关和宪法法律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立法、行政机关、宪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税收财政、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事务;三是联邦权力通常由联邦成员赋予,联邦与联邦成员以及联邦成员之间关系的调节以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准。从联邦制来看,区域发展的引导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力量,还有地方政府层面的力量,而且往往地方政府层面的影响还要大一些。国家层面的引导较多地运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行政的手段。

2. 现代国家区域治理的模式选择

区域治理的模式选择是指按照何种原则对区域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其发展。依照不同的原则,可以有不同的模式选择,这里依行政、经济和资源禀赋分为三种。

一般的,区域发展规划与行政区划相一致,如中国的省、地区、市、县等,英国的郡、区,法国的市镇、省、区、等,既是基本的行政区划,也是区域发展最基本的划分格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区划不仅仅具有行政管理意义,还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体。除中央政府外,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都是以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来制定和实施的;财政税收的体制,用于安排地方社会发展的资源,也基本上是依托行政区划来运作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统计资料同样也归属于行政区划的统计部门,如此等等。这些都为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区域划分提供了方便。

依资源禀赋来规划区域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治理模式。前文所提中国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一章,将中国划分为十个主要的经济区域,实际上依据的就是资源禀赋原则。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资源禀赋,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更好发展。现代经济学对资源禀赋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他的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尔蒂尔·俄林,研究了资源禀赋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出依据资源禀赋的规律开展贸易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我国“一五”时期对以武汉、包头为中心的新工业区的建设,“二五”期间对以兰州为中心的石化工业区的建设,“三五”期间对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的建设等等,都是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

按照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规划区域发展,是当代区域发展运用得越来越多的模式。例如突出城镇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聚集功能、创新功能、辐射功能等,合理规划城市群经济,大大提高了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美国成功建设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大洛杉矶区三大城市群经济体系,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为67%左右。日本则构建了大东京区、阪神区和名古屋区,其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也超过70%。中国则构建了三大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06年,三大城市群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 961.9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3%,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学揭示了一系列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经济规律,如关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与布局的理论、经济增长极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为指导和规划现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工具。

3. 现代国家区域治理的价值取向

现代国家区域治理的价值取向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方面分析。

从政治上看,实施良好的区域治理,促进区域发展,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平等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区域的发展往往与民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发展的差异越大,民族的协调与和谐就越困难,因此,促进落后民族地区发展,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最根本的途径。区域发展的差异,还会带来社会的不平等,解决这种不平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区域的发展。

从经济上看,实施良好的区域治理,不仅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与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实现良性的互动,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发展。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走过了一个从强调地区经济的启动腾飞,先富起来,到强调全局的科学发展;从强调GDP的增长,到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历程。一个更加完善的发展评价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从文化上看,良好的区域治理应该弘扬、提升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之融合、整合成为时代的、全民族的先进文化体系。实践证明,区域的发展与优秀文化的开掘和引领有密切关联,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孕育出的先进的理念和精神,更是值得继承和传播。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为例,深圳敢为天下先、杀开一条血路的开拓精神;温州孕育出的鲜明的市场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敏锐的模仿和学习意识、领先的开放和外向意识等等,也

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这样一些既扎根于地域的文化传统,又开拓于时代新进程中的先进文化,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分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基本谈不上增长。如果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经济的增长,结果几乎等于零,实际上,一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仍然远远低于0.1%。^①平缓流淌的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令人吃惊地进入了急速、陡峭的发展时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精辟地描绘了这一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现代化,从历史进程来讲,是与千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现代化带给人类社会许多新的特点,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已对此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分析现代化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比如W·罗斯托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罗斯托将人类通向现代化的进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通常指近代科学诞生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第二阶段是起飞准备阶段。如欧洲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近代科学出现,世界市场在扩大,专业化在提升,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变革。

第三阶段是起飞阶段。该阶段打破传统经济的停滞状态,开始快速增长,将持续20~30年。

第四阶段是走向成熟阶段。包括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